



近代江南与 中国传统文化

- 唐力行** 从江南到长三角：16世纪以来江南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发展
- 张剑光** 唐五代江南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 徐茂明** 革命抑或改良？——清末民国报刊舆论中的家族问题
- 洪煜** 媒介与日常：以20世纪40年代上海“秋海棠”弹词版权纠纷案为例
- 吴强华、刘晓海** 以艺济困：民国时期评弹义演研究
- 申浩** 发展与转型：清朝末年评弹在上海的“畸形繁荣”
- 詹丹** 中国古代小说序跋整体研究导论

上海三联书店



都市文化研究
Urban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Jiangna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第
19
辑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近代江南与
中国传统文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江南与中国传统文化/苏智良,陈恒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12

(都市文化研究)

ISBN 978-7-5426-6544-7

I. ①近… II. ①苏…②陈… III. ①城市史—研究—华东地区—近代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95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472 号

近代江南与中国传统文化

主 编 / 苏智良 陈 恒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450 千字

印 张 / 28

书 号 / ISBN 978-7-5426-6544-7/K·506

定 价 / 6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主 办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全球城市与世界文明传承研究基地

主 编

苏智良 陈 恒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旭 王安忆 王晓明 许纪霖 孙 逊 杨远婴 杨剑龙 陈思和
周大鸣 钱文亮 唐力行 葛剑雄 詹 丹 熊月之 潘建国 薛 义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阶段性成果

CONTENTS

目
录

近代江南与中国传统文化

1. 从江南到长三角：16 世纪以来江南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发展 唐力行 3
2. 唐五代江南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张剑光 20
3. 革命抑或改良？——清末民国报刊舆论中的家族问题 ... 徐茂明 40
4. 媒介与日常：以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秋海棠”弹词版权纠纷案为例 洪 煜 55
5. 以艺济困：民国时期评弹义演研究 吴强华 刘晓海 71
6. 发展与转型：清朝末年评弹在上海的“畸形繁荣” 申 浩 82
7. 变革与延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众娱乐业务组织方式——以苏州评弹为主要讨论对象 尹业通 季 珩 98
8. 清末江浙官绅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以徐兆玮、杨泰阶、刘绍宽为例 汪颖奇 113
9. “夜”视角与《海上花列传》的“颓废”叙事——兼及其对现代海派小说“颓废”审美的影响 吴智斌 135

城市与社会

10.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伦敦塔的文化意义解读 胡 鹏 149
11. 英属新英格兰早期城市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王伟宏 165

12. 19 世纪德国的城市现代化初探 徐继承 姚倩倩 183
13. 试析土耳其伊斯兰商业精英的崛起 尹 婧 196
14. 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伊朗人三方势力下的巴士拉
1600—1700 鲁迪·马特 210
15. 西人汉译城市孤儿小说的社会启示意义 赵东旭 241
16. 空间裂变：国产都市情感剧空间叙事转变的新向度 王海峰 256
17. 礼学经世：从京师到地方的视角转换
——曾国藩学术思想补说 张智炳 267

艺术中的都市文化

18. 柏拉图理想城邦中的音乐教育 张黎红 289
19. 别现代理论对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 关 煜 301
20. 别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镜”与“灯” 肖明华 313
21. 翻拍剧、《大话西游 3》与别现代 徐 薇 323
22. 中国大陆小城镇电影审美观念的嬗变 张 丹 336
23. 面朝未来立下永远之盐约——浅议查常平
《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一书之独特价值 徐 旭 354
24. “世界关系美学”：神学美学的当代延续 薛霜雨 363
25. 论世界图景逻辑批评理论
——兼评《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 颜复萍 372

光启学术

26. 中国古代小说序跋整体研究导论 詹 丹 389
27. 徐家汇藏书楼文化遗产研讨会 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413

近代江南与中国传统文化

从江南到长三角：16 世纪以来 江南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发展

唐力行

摘要：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长江三角洲地区无疑是经济、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它在行政区划上虽然分属于江浙沪皖四个不同的省区，但历史地看，其内部各个小区域间有机联系与相互整合却早已存在。特别是自 16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市场的兴起，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这一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整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其对内的整合与对外的开放经历了数个阶段的波折，最终形成了今天长三角特有的区位优势。追溯其渊源，今天长三角的形成与发展实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回溯这一历史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无疑对于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的人为分割，真正实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社会的全面整合，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键词：江南；长三角；经济社会；文化；整合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长江三角洲地区无疑是经济、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它在行政区划上虽然分属于江浙沪皖四个不同的省区，但历史地看，其内部各个小区域间有机联系与相互整合却早已存在。特别是自 16 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市场的兴起，海外贸易的发展，这一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整合的步伐大大加快，其对内的整合与对外的开放经历了数个阶段的波折，最终形成了今天长三角特有的区位优势。追溯其渊源，今天长三角的形成与发展实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回溯这一历史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无疑对于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的人为分割，真正实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

角经济社会的全面整合,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从江南到长三角:长三角区域的沿革与区位特征

长三角作为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出现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从地理环境来看,所谓长江三角洲本指以长江入海而形成的冲击扇平原所涵盖的江苏、上海、浙江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而这一地区的核心区域事实上就是历史上的江南地区。因此历史地看,要讨论长三角的发展历史,就必须先对江南区域的发展有所关注。

唐宋以前的江南地区,相对于北方而言,其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相对落后是无庸置疑的,而到了唐宋时期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特别是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江南内部的沟通得到加强,可以看到今天长三角内部的一些重要城市如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都分布在这条运河岸旁,而自唐代后期以来,江南的粮产品便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运送,这一过程一方面加强了江南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亦加大了当时江南地区接受北方先进文化辐射的力度。因此,可以说大运河的存在第一次奠定了江南地区内部网络联系的基础,同时也初步塑就了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性格。

不过,正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指出的,迟至宋代的江南也只是处于其周期发展中的“始发阶段”(burgeoning stage)。^①实际上到唐宋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16世纪以后,更是到达了历史的高峰。如果说,在此前沟通南北的运河在江南区域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的话,那么,到了明代中晚期以后,沟通东西部的长江所起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同时,海运在商业贸易中的作用亦得以凸显。16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华南、华北和长江沿岸的华中地区,形成了日益密切的市场网络,至迟到18世纪初,全国市场的架构已基本完成。清代前期的全国市场,是由三条主要商业网络带所构成的:一条是由长江中下游航道为干道组成的东西向国内网络带,一条是由京杭大运河、赣江、大庾岭商道为干道组成的南北向国内网络带,另一条则是由东北到广州沿海的海运网络带,以此三条

^①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商业网络带为主轴,构成了当时的全国市场。^①而这三条商道恰好交汇于苏州地区,苏州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张商业网络的中心。

与此同时,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当时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武装走私的海商将江南地区卷入了世界市场与贸易体系之中,在当时江南的对外贸易格局中,以太仓的刘家港为中心,以徽州海商为中介,江南的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江南区域的对外开放性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伴随着海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苏州的崛起是江南区域发展史上带有标志性的事件。乾隆27年《陕西会馆碑记》赞叹说:“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③由此可见苏州作为全国商业之中心,其繁盛局面已经非一般城市可相颉颃的了。因此,近代以前,江南内部的整合与网络联系正是以苏州为中心展开的,而现代所谓长三角的概念在这一阶段也初具雏形。

不过这一局面到了近代开始发生改变,苏州逐渐开始由江南的中心转变为上海的腹地。这一变化的转折点是与太平天国运动在江南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场战争中,苏州死人无数,毁房无数,荒地无数。据同治《苏州府志·田赋二》的统计,道光十年(1830年)苏州府共有“实在人丁”为3412694人,经过“庚申之难”,同治四年(1865年)苏州府的“实在人丁”锐减至1288145人,净减2124549人,这还不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简单地讲,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苏州人口损失了约三分之二。人口大量死亡的结果就是耕地荒芜,工商业萧条。

与苏州所遭到的破坏相比,上海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繁荣了起来。1860年,太平军挺进苏常,江南的缙绅商贾大规模逃入上海租界,导致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加到50万,一度曾达到了70万。因之,有人估计1860—1862年,至少有650万银圆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战争意外地推动了上海租界的飞速发展,从此以后,租界开始由上海城外的荒芜弃地变成了上海城市的中心,上海在江南的地位也随之改变,它不再是

① 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台湾大学文学院编《文史哲学报》1995年总第4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

③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1页。

松江府下的一个普通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国际商港。“从18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因此,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①

正是随着上海对苏州的取代,现代意义上的长三角地区才最终得以形成。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就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城市,而这一地位正是建立在长三角这一广袤腹地基础上的。随着上海的发展,在中心城市的辐射下,一方面长三角内部的网络联系更趋紧密并且得到不断的扩展,另一方面长三角腹地城市也正是通过上海将自己与海外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进一步塑造了其开放的性格。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今天,上海一直延续着其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中的地位。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当前长三角的内涵、发展道路等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但是区域发展既有的“路径依赖”却仍然对16世纪以来江南区域及长三角内部的整合与开放问题的研究有着启示意义,那么所谓的内部整合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苏州时代与上海时代的差异又在哪里呢?

二、苏州时代：内部整合的两种类型^②

正如我们已经阐明的,16世纪以后直至近代,苏州一直是江南的中心,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其内部整合的中心点所在。前近代时期,正是以苏州为中心,因着各种条件的差异,在当时的长三角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内部整合方式。在此,我们主要分析其中主要的两种类型,亦希图由此而见一斑。

(一) 由边缘向中心的整合：徽州与苏州的个案

徽州无疑是江南地理范围的边缘地区,但是,正是在这里,自16世纪以后,产生了著名的徽商,为近世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而徽商之所以能执商界之牛耳,跟徽州与苏州之间的整合与互动是紧密相

^① 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史林》2003年第1期。

^② 苏州时代的两种整合类型,可分别参考唐力行等著《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罗婧著《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关的。

虽然说徽州为江南边缘,苏州为江南中心,但如果从地图上看,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并不算太远,仅为270余公里,应该说是相邻而方便的。只是因为地理条件所限,两地陆路交通极其不便,《徽商便览·徽州总论》指出:“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大鄣昱岭雄其东;浙岭五岭峻其西;大黉、白际互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路皆鸟道,凿险缒幽。”^①因此,水路就成了两地互动的主要通道。但徽州的河流与苏州不同:苏州的水平缓、四季盈盈,而徽州的水湍急、季节性强。由于徽州地势高峻,“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然仅与新安之平地等”,^②徽州的水有高屋建瓴之势,滩高流急,从而形成难进易出之势。徽州至苏州的水道有二:北可由青弋江至芜湖,顺长江而下,在镇江入运河,可抵苏州。东由新安江至杭州,再转入运河至苏州。千百年来徽州商人不避艰难,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络绎于徽州的道上,将徽州与苏州沟通起来。

苏州与徽州两地自古以来就有密切联系。据《新安名族志》载,有陆、朱、张、叶四姓的始迁祖分别于唐、宋两代由苏州迁入徽州。苏州四大名族中,除顾姓外,陆、朱、张多有迁居徽者。另据语言学者对徽语的田野考察,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③给徽州带来中原及吴地的文化。可见,苏州、徽州最先的互动是由北向南互动的继续,是在江南范围内的由东向西的互动。

而由徽州乡村向苏州都市的自西向东的移动,则稍迟于东向西的移动。其原动力则为经济要素。“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④“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⑤最早关于徽人经商的记录出现在西晋。许承尧在《日新录记徽俗二则》一文中说:“《知新录》云:徽俗好离家,动经数、十年不归。读司马晞传有云,晞未败时,讌会辄令娼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怨。

① 吴日法:《徽商便览·徽州总论》。

②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汉口志序》。

③ 曹志耘:《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 《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

⑤ 万历《歙志·货殖》。

后晞果徙新安。则知此风自昔已然。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①

此后,徽州人外出经商不绝如缕。南宋建都临安,徽州商人得到一个较大的发展机会。至明清时期,这种由农村迁往农村的移民方向发生变化,徽州人开始由农村迁往市镇,由山区迁往平原地区。万历年间盐政改革,实行票盐制,徽商垄断淮盐与浙盐两大盐场,积累巨额资本,为徽州人进军江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苏州,从而形成两地密切互动创造了条件。明唐寅《阊门即事》云:“吴阊到枫桥,列肆二十里。”阊门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的天下,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

苏州与徽州两地的互动,是由徽商充当媒介的。因此,考察徽州商人与徽州家族向苏州的移徙,以及他们在定居地的发展及其与家乡的长久联系,是我们探讨两地互动必不可少的环节。大阜潘氏原是徽州商贾世家,清初徙入苏州,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乾嘉以后成为苏州势力最为煊赫的科第世家、宦宦世家、积善世家,同时还是晚清苏州酱园业的行业领袖。而那些留在大阜以及后来由苏州迁回故里的潘氏族人们则日渐式微,生活困窘。大阜潘氏分居徽苏两地,尽管往来不断,互有影响,但由于徽苏两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两地家族的发展结果却有霄壤之别。通过对徽苏两地潘氏家族的迁徙过程和互动形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徽州与苏州乃至其他地区的家族迁徙及其文化互动具有如下特点:一、徽州家族的迁徙主要是经商的形式向外迁出,徽商尽管也大量回流到故里,但仍有不少徽商滞留在外,而这些滞留在外的徽商往往就是徽商中的精英人物,他们对苏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二、与徽商大量外流相比,徽州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外地人流入徽州的极少,因而徽州与外地之间的家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单向性的外流,地域间的互动主要是通过徽州人自己来实现。徽州人在促进了异地繁荣的同时,却不断地借助于资金的回流,将宗族意识输回故里,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族墓等,从而保证了徽州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持续静止状态,进一步扩大了徽苏两地社会发展的差距。所以,在徽州与苏州的互动中,徽商的资本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两地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正是在互动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

^①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6。

的经济中心,并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着人口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的经济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取大宗商业利润。其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建祠堂、修族谱、置族田、办族学,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缚了社会转型。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他们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带到苏州等大都市社会,凝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

而两地整合的最高层次就是文化上的相互认知。苏州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是美好的,“沈归愚《国朝诗别裁集》选歙人诗,……其论吴茵次诗则赏其《虎丘酒楼》句:‘七里水环花市绿,一楼山向酒人青。’谓‘写山塘风景如画’。”^①不仅有虎丘、山塘的如画风景,苏州还是徽州人的淘金地。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的长久之道,但良莠不齐,不免有欺诈和刻薄的行为,引起苏州人的反感。所以徽商力图改变苏州人对徽州人的认知。士大夫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在苏州十分注重与士的交游。歙县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下士”。^②婺源李贤,“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③徽商与文人相交而相知,这对他们融入苏州社会和经营活动是很有好处的。徽州文人汪道昆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好处,指出:“其(休宁商吴用良)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④此外,如归有光、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焦竑、陈子龙、冯梦祯、陈继儒、茅坤、吴伟业、钱谦益、汪琬、钱大昕辈都为徽商撰写过充满理解、又不乏褒美之辞的墓志铭。苏州人与徽州人相互的认知越深,则相互吸引力越大,造成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的格局。

(二) 中心地的整合与辐射作用: 苏州盛泽的个案

盛泽镇地处苏州吴江东南部,地理坐标东经 $120^{\circ}40'$, 北纬 $30^{\circ}54'$ 。作为

① 《歙事闲谭》卷12《沈归愚评歙人诗》。

② (明)汤显祖:《汤显祖集》卷四十一《有明处士潘仲公暨吴儒人合葬志铭》。

③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68页。

④ 《太函集》卷五十二《明故太学生吴用良墓志铭》。

一个市镇聚落,它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苏州吴江县;在区域经济关系上是江南蚕桑丝织业专业市镇群中的重要一员;从整体性区位意义来说,它又居于具有深厚经济社会文化积淀的江南核心区域之列。

16 世纪前后,全国各地商品化作物种植的专门化与地域分工皆呈现出日益明确的趋势。江南地区除太湖东南岸一带成为主要的蚕桑区之外,苏松一带的棉花种植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农业结构已经由单一式转变为多元化,乃至出现了蚕桑、植棉压倒稻作的现象,这一变化还与手工业有着部分结合,在乡间兴起了丝织业与棉纺织业。显然,绝大部分丝绸与半数以上的布匹都不可能在乡间自行消费,其商品化与生产的专业化倾向日趋显著。然而,尽管蚕桑丝织业与棉纺织业可以给农户带来远胜于单一务农的收益,但人口日益稠密的江南地区因田亩面积下降,产粮区收缩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因此,16 世纪以来,整个江南地区生丝、丝绸与棉花、棉布的对外输出与大量的粮食购入构成了对外经济交往的内在需求趋向,从而在推动了该地区商品交换的兴盛的同时,促进了区域性经济、社会、文化的整合。

这正是 16 世纪以来盛泽崛起的重要背景,但是作为一个身处蚕桑区却不宜农桑的小渔村兼定期集市,它的崛起又是与周边地区的整合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技术支撑层面,盛泽丝织业的兴起源于技术的引进。“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苏州)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而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①正是在郡城苏州丝织业的辐射影响之下,盛泽这个明初的小村落才得以凭借丝织业的兴盛而迅速发展,成市升镇,富甲一方。除了苏州人“手把手”地教会盛泽、黄溪四乡农户丝织技术外,以“包头绢”为主打丝织品的双林在距盛泽近两日内的水程,因出产“濮绸”闻名天下的濮院距盛泽 50 里,擅织大环锦的新塍仅与盛泽相隔 30 里,另一个长三角区域重要的丝织业专业市镇——王江泾与盛泽只有 6 至 7 里之间,它们的丝织工艺与技术无不逐渐地被善于学习的盛泽人所吸纳。

其次,丝织业之所以能够在 16 世纪以后的盛泽取得迅速发展,更基于其处长三角蚕桑区中心的优越地利。靠近原料产地的手工业布局使得盛泽四乡丝织业拥有源源不绝的生丝来源。长三角区域最大的两个偏重蚕桑业的市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 38《生业》。

镇网络——乌青与南浔、震泽分别位于盛泽45里、36至48里的水程之内，它们的部分乡脚更与盛泽的四乡接壤，生丝供应甚至不必经过这些中心市镇的集散，而直接输入盛泽丝市。如前所述的震泽镇之乡脚开弦弓村就有航船专线直通盛泽。此外，为了求得质地上好的经纬，盛泽机户还会在新丝上市的时节前往乌青“零买经纬自织”，而乌青镇上又有商贩“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①道光年间(1821—1850)，“凡江浙两省之以蚕织为业者，俱萃于是，商贾辐辏，虽弹丸之地，而繁华过他郡”。^②

最后，在销售网络方面，16世纪以来，濮院、双林、王江泾与盛泽并立为长三角区域的四大绸市，其中，濮院兴起于宋，元时已经相当兴盛；王江泾“自宋元明以来，望族聚处，蒸蒸富庶”^③；以产绢闻名的双林，早在南宋已有收购纱绢的集市——绢巷；与它们相比，明初还只是个小村落的盛泽丝织业起步最晚。但由于它处长三角中心地带，自乾隆年间盛泽新建庄面以后，吴江县内及嘉兴、湖州府县邻近市镇的丝织品均已到此上市。其中，濮院所出的濮绸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经由盛泽转销全国。褚凤翔在其于乾隆十八年(1753)所作的《禾事杂吟》中这样写道：“濮绸新样似西绫，染作官衫见未曾，一夜北轺来盛泽，机中富贵价频增。”“至嘉(庆)道(光)后，绸市渐移于江苏盛泽，而濮市乃稍稍衰息。”^④双林的包头绢也因与盛泽所产相似却稍逊，而在竞争中渐落下风。因丝绸品种齐全而市易兴盛的盛泽则出现了“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焉”^⑤的局面。清代，长期居留于镇市上的客商为了加强同乡之间的团结协作，更好地维护其在丝绸贸易中的共同利益，先后在盛泽设立了金陵、济宁、济东、山西、宁国、宁绍、徽宁共七所商业性会馆。从其馆籍来看，清前期及中期盛泽绸的营销网络以华中、华北为主，包括宁皖平原、长江沿岸、浙闽沿海、太行山两麓及长城内外，甚至部分丝绸经与海商联系紧密的山东商人与徽州商人之手远销海外。另外，随着盛泽绸市对周边各专业市镇丝织品的集散功能日益增强，原先在其四乡及周边地区经营的外籍客

① (清)张园真：《乌青文献》卷3《土产》。

② 道光《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缘始碑记》，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6页。

③ 宣统《闻川志稿》序。

④ 光绪《桐乡县志》卷7《物产》。

⑤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